

# 启蒙的星座：伊曼努尔·康德

——纪念康德逝世200周年

■卫攸宁

1724年4月22日，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出生在普鲁士王国首都柯尼斯堡。说是首都，普鲁士王国的君主们却难得降尊纡贵驾临这座城市。1618年东普鲁士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勃兰登堡选帝侯的领地，1701年普鲁士王国建立时，国王在柯尼斯堡加冕，但普鲁士王国真正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勃兰登堡的首府柏林。尽管如此，康德对于自己出生的城市仍然极为满意。他除了一次到但泽的旅行外，康德终生未出柯尼斯堡一步。那时，柯尼斯堡汇聚了立陶宛人、俄国人、波兰人、相当数量的犹太人、荷兰和英国的商人以及其他巴尔干居民，还有16世纪从荷兰、法国流亡来的胡格诺教徒——他们仍然讲法语，保留着自己的风俗。在这样“世界性”的城市中长大的康德，文化的多样性与宽容原则对他几乎不言自明，而他拥有的在文化交流、民情风物、国情地理等方面丰富的知识，常常令他的听众或读者震惊不已，甚而相信他长期旅居国外。

18世纪德国肖像画家的水准是颇为可疑的。流传下来的康德画像上，他的面部特征往往大相径庭、相互矛盾。今天，我们只能从为数不多的几幅画像上揣摸一下康德的模样。他是个蜉蝣的，胸部狭窄的小个子，头显得很大，按当时的风俗戴着扑了香粉的假发，脑后用丝带扎着一条辫子——尼采因此嘲弄他是“柯尼斯堡的中国人”；他相貌中最好看的部分是一双晶莹的蓝眼睛，宁和深邃，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明镜

周刊》的记者戏谑地写道：“这位独一无二的思想家似乎不宜于成为超级明星。他缺乏让人顶礼膜拜的招牌，既没有贝多芬锋芒毕露的狮鬃，也没有莫扎特的孩子气，更没有歌德女人故事的诱惑力，抑或瓦格纳的疯狂，抑或尼采的悲剧。”<sup>①</sup>然而康德在他同时代人眼中，并不缺乏魅力。1746年父亲死后，他以担任乡村牧师和贵族的私人教师维持生计。其中一位雇主凯泽林伯爵的夫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她的引导下，康德一度进入上流社会。当时上流社会非常看重一个人的机智高雅的谈吐，显然康德完全符合这样的期望，罕有学者能像他那样，很快成了社交活动的“灵魂”。他的学生之一，后来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赫德尔这样描述他：“我有幸认识一位哲学家，他是我的老师。他在其盛年仍保有一种年轻人的欢快，而我相信这将保持到他晚年。他开放的、为思想而生的头脑拥有无法摧毁的朝气与愉悦。最有思想的言谈从他口中倾泻而出，他会开玩笑，擅长幽默，是个性情中人。”<sup>②</sup>

为康德严谨到枯燥、细致到冗长的文风所苦的读者，抱着“文如其人”的念头，难以想象他竟是一个热爱生活、风趣幽默的人。他喜爱台球游戏，技艺卓越，学生时代曾和普鲁士军官赌赛来补贴生活，成为讲师以后，每天午餐前，他还总要在咖啡厅里来上一局。晚间社交活动中，他热衷于一种西班牙纸牌游戏，技巧娴熟。那时他穿着缀有昂贵镶边的华丽外衣，领口和袖口露

出精致的花边,出现在各种场合,以优雅的风度引人注目。像所有热爱生活的人一样,他至少有一次坠入热恋,却因缺乏资产无法结婚,多年后他苦涩地回忆道:“在我可能需要女人的时候,我没法养活;而在我能养活的时候,我已经不需要女人了。”<sup>13</sup>他需要朋友和社交活动,如同需要科学研究和哲学思考一样。当他终于购买了自己的居所,雇用了一位男仆、一位厨娘后,他每日邀请朋友们共进午餐。康德当代阐释者格哈德不无伤感地注意到:“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用概念来表达自己的人,清楚地知道,概念并不是一切。”<sup>14</sup>

编外讲师没有薪水,全赖学生付的课时费度日,因此康德那时授课每周多达24小时。他开设的课包括数学、物理学、逻辑学、形而上学、伦理学、自然法、教育学;1760年起加设自然神学以及百科全书学;1772年加设物理地理学与人类学。他声音微弱,但课堂仍然时常人满为患。于是,为了增加收入,他额外组织一些很受欢迎的讲演。“七年战争(1756~1763)期间,占领柯尼斯堡的俄国军官对他的讲演很着迷,他们的将军派专用的马车接送他。赫德尔回忆道:“他富有教益的讲演对人们是最有意思的娱乐活动。他检验莱布尼茨、沃尔夫、鲍姆加藤、克鲁修斯、休谟的哲学,关注开普勒、牛顿与物理学家们的自然法则,又以同样求知的、批判的精神,解读当时新出版的卢梭的作品,评价一切他所了解到的新的自然发现,然后总是再回到自然知识的普遍性特征,与人的道德的价值特征这两者间的差异上去。他的讲演涉及到人类,民族,自然史,自然学说以及人生经验,而这些主题也为他的听众们所喜爱。他从不认为,知识有值得认识与不值得认识之分,没有任何阴谋,宗派主义,利益,出名的野心能诱惑他,与扩展真知,揭示真理作对。他鼓励并以令人愉快的方式要求每个人自己思考。然而他的性情决不专断。”<sup>15</sup>福柯曾在《何为启蒙?》

一文中谈到康德同名的论文对于启蒙的定义难以把握;然而,启蒙如果在实践层面上来理解,不就是一场普及教育而要求人们自己思考、学会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运动吗?

康德的生活遵循严格的时间表:5点起床,写作至7点或8点的上课时间,午餐1点,之后是一个小时的散步,然后他工作直到晚上10点。据说柯尼斯堡的居民曾以康德散步的时间来校对钟表,人们往往据此惊叹,哲学家生活的理性化。然而早在18世纪初,像钟表一样准确就成为普鲁士国王治国的理想和他对臣民的要求,19世纪以后普鲁士模式渐渐为整个德国所效仿,今天已成为德国民族性的一部分。因此《明镜周刊》写道:“他既不怪诞又不惊人的人生烙着老普鲁士美德的印记,宜人的平和,无法估量的勤奋,责任意识,认真而且持之以恒,谦虚谨慎,怀疑到底,对自己真诚,对朋友忠诚,以及爱好秩序。”

虽然康德晚年始获得世界性的声誉,但他很早已为人赏识。爱兰根大学与耶拿大学先后请他任教,柯尼斯堡大学也曾提供给他诗学的教席,然而康德坚持等待了15年,直到获得所期待的柯尼斯堡大学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正教授职位。他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绝不让步;也正如赫德尔看到的那样,绝不让名望和野心迷惑自己。1778年,十分欣赏康德哲学的国务大臣策德利茨男爵两次召康德前往普鲁士最重要的哈勒大学任教,希望他参与普鲁士的大学改革计划。条件不能说不诱人:800塔勒银币的年薪,外加宫廷顾问的头衔。康德拒绝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志向:“获利及在更大的舞台上赢得荣誉,对我诱惑甚微。我所期望的是一种安宁的生活状况,符合我的需要,为工作,沉思与交际所充实,那么我非常敏感的,但通常无忧无虑的心情以及我那更敏感的,但并不多病的身体,不致因工作的繁重而紧张劳累,而这些我已得到了。所有的变化都让我不安,尽管它们

似乎能改善我的状况……<sup>⑥</sup>作为补偿,康德将三年后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献给策德利茨。在康德之前,哲学家克利斯蒂安·沃尔夫也拒绝了柏林科学院院长的职位以及2000塔勒银币的年薪,而满足于哈勒大学的教席。他们一起建立了德国学者忠于学术的传统,在他们看来,整个启蒙时代的工作,要比仕途的飞黄腾达重要和有意义得多。

毫无疑问,启蒙运动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最重要时期之一,它从各方面为人类世界的转型提出了要求,在它之后两个世纪至今的发展,是它的理想的逐步实现。现代性所有的成就、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运动中找到根源。15世纪以来的地理大发现,不仅使欧洲能够近距离观察欧洲以外的文明形式,而且使欧洲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思考文明之间的关系与发展问题,世界公民的观念逐渐形成;文艺复兴时期,布鲁诺、伽利略以及达芬奇、培根等人的科学发现与科学理论研究,使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的“范式”开始成型;而人文主义运动,经过宗教改革与人文知识分子的长期努力,其基本内容——自由、平等与人权,已成为普遍的价值观念。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对欧洲知识界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人类文明进步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各个领域掀起了巨大的思想热潮,思想家们开始反思和批判欧洲文明的现实状况,在欧洲所有主要国家中都出现了称为“启蒙”的运动。教会思想权威的地位动摇了,它感到启蒙运动带来的巨大威胁,胜过任何一次宗教改革。因此在许多国家,启蒙运动表现为反抗教会思想专制的斗争,说是雅典与耶路撒冷的战争也不为过。

在当时的欧洲大陆,普鲁士虽然经济文化发展滞后,却是最开明的国家。1740年即位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有“哲人王”之誉,与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达朗贝等过从甚密,为拉美特利、爱尔维修、卢梭等提供过庇护。那时

法国启蒙思想家还与教会做着艰苦的斗争,时刻面临着著作被焚毁、人被扔进巴士底狱的危险。普鲁士的思想家们却能享受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国王自己就热衷于私下拿宗教当笑料。而康德虽然从国王那里拿薪水,却建立了一整套共和主义的政治哲学。康德在1784年《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感叹道,启蒙时代是“弗里德里希的世纪”。

当代哲学家伊尔利茨认为:“康德的思想只有从欧洲启蒙的基本观念入手,作为对这些观念批判性的发展来理解。”<sup>⑦</sup>康德开始学术生涯的时候,启蒙运动逐渐进入高潮。各个领域内的新观念层出不穷,每种理论都趋于极端,彼此矛盾,甚至开始颠覆启蒙运动自身的基本原则:宽容与自由、理性与批判的精神。在理论哲学领域,英国经验主义在休谟的发展下趋向于极端:他陷入怀疑主义,宣称所有一切知识不过是人们的习惯与经验的总和。尚处在幼年的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受到质疑,而更大的危险则是,道德规范的确实性陷入晦暗不明之中。康德承认,是休谟惊醒了他对莱布尼茨—沃尔夫的教条主义的“昏眠”,因为他早年的哲学思考未能脱离普鲁士居于主导地位的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影响。这一思考是纯粹形而上学式的,即通过概念对上帝、对世界进行哲学演绎。1763年,康德《由上帝存在的概念不能得出的,唯一关于上帝存在的可能性证明》一文,拒斥了纯粹理性证明上帝存在的可能性。1766年《通灵者的梦:由形而上学的梦得到解释》一文中他甚至批判道,莱布尼茨—沃尔夫的教条主义导向白日梦和幻觉。然而康德同样拒斥休谟的怀疑主义、洛克的经验主义。尽管他们使他看到了理念论的问题所在,但他没有放弃对人类理性的信任。

实践哲学领域同样如此。法国启蒙哲学家伏尔泰等为宗教迫害所苦,开始相信启蒙必须由一位被启蒙过的君主通过政治改革来进行,实际上他们是想借助王权对抗教会,但由此发

展出一种后来被19世纪法国哲学家批判为“启蒙专制主义”的政治学理论。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帝、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以及俄国的叶卡特琳娜大帝，是当时启蒙专制主义付诸实践的代表。这些明君摆脱了“君权神授”的观念，然而他们为了国家利益不择手段，欧洲强权政治的传统因此形成。洛克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站在启蒙专制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反面。但欧洲连续不断的战争使卢梭逐渐趋向另一个极端：他相信科学与艺术的发展败坏了人类的道德，转而主张后来对19世纪影响极大且至今不衰的田园牧歌式的浪漫主义，最后甚至与坚持科学和进步的百科全书派公开决裂。康德曾经读卢梭的《爱弥尔》忘了散步，卢梭的一幅肖像是他居室内的惟一装饰，然而他并未因此追随卢梭。通过卢梭，他看到了启蒙运动潜在的隐忧：在一个科学与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政治与道德领域的滞后会带来怎样的危险。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大意义，海德格尔哲学对科学和技术的拒斥，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忧虑，不妨视作卢梭与康德思考的延续。康德看到了唯物论导致的伦理学危机，他以“人的尊严”为出发点，以在普鲁士影响广泛的斯多葛派哲学中的“责任”观念作为道德的根据，开始为建立一种普遍伦理学而努力。

在这样喧嚣巨变的时代，康德犀利的眼睛透过重重迷雾，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上帝的启示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权威，不能再作为建构人类世界的依据了。而启蒙运动表明，人类完全有能力运用自己的理性，建立自己的世界，成为自己的世界的尺度。然而最大的问题在于，如启蒙运动自身历程显示的那样，人类在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过程中，可能会误用理性，因为理性总是试图超越自己的界限。因此，为人类理性立法来批判性地发展启蒙运动，就成为关键。孟德斯鸠、卢梭从政治上将立法的权力还给人民，而康德在这样的背景下则相信，人类能够而且应该

成为人类世界的尺度，无需某种权威的启示。在他看来，人类自身理性的发展与自然的目的一致，他用启蒙就是人类走向成熟的过程这样的比喻来说明这一进程的合理性。他是第一个给予人类如此高贵地位的哲学家。他证明人类不但拥有自由，还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因为，人类必须服从现象世界的法则，这是人类为自己的自由需要付出的代价。在哲学上，康德认识到，哲学中争论不休的许多问题既非概念来源的错误，也非认识过程中经验观察的错误，而是由于人类理性的误用。哲学之思不再只是一种柏拉图式的静观，而是一种人类理性积极参与其中的创造性过程。正因如此，批判的精神就至关重要，因为惟有批判的精神，能够使人类理性避免成为权威的专断的危险。

而这一批判哲学方法上的洞见，康德得益于他早期的科学哲学理论研究。

康德研究者们几乎都同意，他的思维方式同自然科学家一样：当两个命题相互矛盾时，他就把它们放到更大的范畴下去理解。康德最初是一位自然科学家，最重要的著作有1755年匿名出版的《自然通史与天体论》。他清楚地知道这篇论文的意义，题献给当时已赢得“大帝”之名的弗里德里希。不幸的是，出版商破产了，这本书没能及时送到图书博览会，也没能送到国王手里。直到四十年后，拉普拉斯独立研究出的星云理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康德罕为人知的理论才又重现光彩。这本不过50页的小书展示了作者非同一般的才能、冷静与胆量。康德从牛顿力学出发，描述了空间中的星体如何形成，他甚至自信地宣告：“给我物质，我就能创造一个世界！”这位大胆的思想家不久就在研究时间、空间问题时发现了二律背反。这项发现向康德揭示出，理论思考有其界限，而这个界限同经验观察的界限一致。

1769年他获得了重要的洞见，他开始在自己身上寻找法则：知性并不从自然中发现经验

前的法则,而是为自身,也为自然制定法则<sup>⑧</sup>。这就是著名的“哥白尼倒转”。然后是十年艰苦的准备工作,康德深居简出,几乎没有新作品问世,人们差不多以为他已经到头了。1781年,56岁的康德终于在长期深入思考后,于六个月内完成了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这部伟大的作品起初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太多的新概念以及过长的句子,使得专业哲学家也感到难以理解,斥之为“晦暗不明”,以至于康德不得不在1787年的第二版中做了完善和改动。但他创作的鼎盛时期到来了。1788年《实践理性批判》、1790年《判断力批判》的出版完成了他的“三大批判”,此外还有许多重要的作品以及论文问世,如1783年《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4年《世界公民眼中的普遍历史理念》、1786年《什么叫做:在思想中辨别方向?》、1792年《论人性中极端的恶》等等。

《纯粹理性批判》谱写了认识论的新篇章。康德认为,时间与空间无法定义,也无法确定,因为它们是人类认识主体的直观形式,是人类将世界认知为“现象”的条件,而非对象。任何知识都是综合的,是人类经验前即已知道的理念运用于经验的结果。纯粹直观与纯粹理念——前者如空间与时间,后者如上帝,都是人类认知的界限。理念论单一地从知识的有效性角度考虑问题,而经验论单一地从知识的来源角度考虑问题,因此各执一端,陷入对认识的错误理解。认识只能由知性在现象范围内进行,人类超越现象范围的思考属于理性范围,其正确与否恰如二律背反,无法获得客观的证明。反过来,当人们想要知识性地证明上帝存在时,就是用知性的法则取代了理性的法则,同样陷入谬误。康德第一次区分了知性与理性的不同,指出其各自运用的范围,而哲学中的种种谬误,均来自一方对另一方领域的僭越。

康德的伦理学同样源于对道德的界限的思考,以及人类作为道德立法者的信念。最重要的

著作有1785年《道德形而上学基础》、1788年《实践理性批判》、1797年《道德形而上学》。他著名的“绝对命令”,是为检验道德规范而制定的,是规范的规范。人自身就是目的,因此绝不能单纯地作为手段被使用,工具理性被永远排除于道德的范围之外。以此为根据,我们便能判断任何道德规范是否客观地具有道德性,是否应作为人们行为的准则。道德之所以可能,因为人们的行为遵守道德规范并非出于喜好,而是出于责任:每个人都有责任维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以及维护他人作为人的尊严。

在1786年《人类历史开端猜想》、1795年《论永久和平》等一系列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论文中,康德拒斥卢梭认为科学与艺术的发展败坏了人类道德的观点。他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必须经历一系列制度化过程,而制度化过程又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科学与艺术的发展。他赞同卢梭的意见,将自由等基本人权归为人的自然权利,但他又指出,这些权利只能通过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建构来实现。政治制度的原则应该而且必须符合普遍的理性,这样世界公民的国家理想才有可能逐渐实现。然而应该看到,康德并不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进步于他是一种理念,而非某种乌托邦计划。

康德哲学中,自律也许是最基本的概念。认识,道德行为,审美判断,全都依赖于主体自身理性的正确运用,而主体自身需要被教育、需要被启蒙,但又不能通过权威启示的方式。而且,正如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揭示的那样,主体往往为惰性所腐蚀,乐于听从权威的教导,而处在一种不成熟的、无法运用自身理性的状态。除了自律,或者说自我反思的批判精神,康德并没有提供解决的办法。理性的社会化问题更多在当代对公共世界的研究,尤其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决。当康德将人类拔高到人类世界的尺度和立法者的地位时,当他将他的哲学称为“先验唯心主

义”时,并没有想到,曾为他斥作“哲学的丑闻”的贝克莱唯心主义,借着 he 耕耘的土地,在德国悄然萌芽了。

德国唯心主义打着康德的招牌,尊他为德国唯心主义的奠基人。尤其这一学派的先驱费希特,曾经是康德的朋友,自称是他的学生,更乐得顺水推舟。康德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唯心主义的灾难,他于1799年8月7日,发表了《关于费希特知识学的声明》。其中他认为费希特的知识学体系站不住脚,明确表示反对费希特的作为,甚至开始怀疑费希特对他的巴结别有用心,痛心疾首地斥责道:“有句意大利谚语说,‘上帝保佑我们免受朋友的陷害,至于敌人——我们自己会小心防范!’有这样的……间或爱欺骗的,阴险的,暗中盼望我们沉沦而说着友好的话语的……所谓的朋友,对他们以及他们布好的圈套,人们任怎样小心也不够。”<sup>90</sup>然而不幸的是,他荏弱衰老的身体不再供给他力量了。1785年以后,他日益有力不从心之感,讲课也渐渐无精打采。他减少了授课时间,从每周13个小时减少到7~8个小时,最后在1797年停止了讲课。1800年以后的著作,他不得不委托他人代为整理出版。但是,他仍然坚持不懈地工作,从1796年开始构思一部新的著作,为了澄清他的“先验”哲学以及反对已经开始的唯心主义运动,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康德遗著》的笔记。还在和费希特划清界限之前一年,他已向朋友们抱怨剧烈的头痛。他越来越容易感到疲倦,时常在阅读思考之际悄然睡去。有一次,他的睡帽滑落到蜡烛上,差点引起一场火灾。1803年他第一次中风后,记忆力越来越差,渐渐不能辨别方向和清晰地说话了。但是,1804年2月3日,他还能勉力对医生说:“人性的感觉还没有离开我。”他几乎吃不下什么东西了,瘦得只剩下骨头,轻得好像不存在。11日深夜,他喝了几勺加了糖水的葡萄酒后说道:“很好。”

这是他最后的话语。

12日上午11点,康德溘然逝去。消息传出,柯尼斯堡人自发地来到他的住所默哀致敬,人流持续了整整一天。28日的葬礼简朴而隆重,市民们组成的送葬队伍绵延不尽,柯尼斯堡所有的钟一起敲响。人们真心地爱他,并非因为他是一位大哲学家,为他的城市增添了荣耀,而是因为他的道德,他为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尊严所做的一切努力。直到今天,尽管柯尼斯堡再也不是德国的领土,这位世界公民朴素的墓前仍然鲜花不断。

然而,这不是终结。

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继续发展着他们的唯心主义体系,人人都宣布自己是真理的权威,康德的批判精神被遗忘得一干二净。卡尔·波普尔愤怒地写道:“在康德死后,当他不能再保护自己时,这位世界公民就被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了他们的目的成功地利用了,他们完全不顾他为反对浪漫主义精神,反对矫揉造作的狂热以及幻想所说和所写的一切。”<sup>91</sup>在政治和历史哲学领域,人的尊严的价值被遗忘了,历史主义占了统治地位。康德之后的、经过唯心主义运动改造的哲学家,无不试图将人类历史归结于某种隐蔽的、只能由某些哲学家才有特权发现并证明其真理的法则,而否认人的自由,进而否认人的尊严。按照这些哲学家的意见,人不过是历史进程中渺小的轮子、历史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上的螺丝钉,那么人哪里还有自由、还有尊严可言呢?人不过是历史的奴隶罢了!人的地位堕落到无以复加的低谷,因为之前人作为上帝的造物存在,尚更有尊严,而基督教的教义也允许人有自由意志。对个人的尊严、自由、理性以及宽容,这些启蒙运动基本原则的背弃,为20世纪带来了可怕的灾难。而始作俑者正是打着美妙口号的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然而表面看来,现代性的恶果却似乎来自启蒙运动的科学权威、理性主义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信仰;为此,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如以撒·柏林甚至投身到“反启

蒙运动”中去。然而,后现代思想家们赖以立身的反对权威、自由、宽容、批判和怀疑的精神,正是启蒙运动的精髓啊!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和理想主义从来不是启蒙运动的惟一内容,正相反,它们是康德批判哲学批判的对象。

给康德贴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标签的,只能是唯心主义者自己。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到了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们竟需要一次“回到康德去!”的运动来重新解读康德,抵消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然而更重要的,对康德的再诠释开始于20世纪中叶,即二战后思想家们对于极权主义的反思。卡尔·波普尔准确地看到,德国唯心主义的巅峰黑格尔哲学是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而这正是唯心主义运动摧毁启蒙运动的结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德文版献辞是“为了纪念自由与人性的哲学家康德”。在康德逝世150周年纪念里,他公正地将康德称作“启蒙最后一位伟大的先锋”。罗尔斯、哈贝马斯、阿佩尔……这些理性哲学家们继承和发展了康德,就是后现代哲学家福柯,也在康德的宽容和批判精神里找到了他的认同。康德是惟一能够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对西方哲学和西方世界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至今越来越多地被阅读的哲学家。

因为,今天的世界,也许比任何时候更需要捍卫个人尊严的道德责任意识以及理性、批判、自由、宽容和博爱的精神。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国际政治上的强权政治、极权主义的泛滥、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相对主义、民族主义和世界范围内的邪教运动、恐怖主义……这是我们时代的现实。今天,如果我们像康德在220年前那样问: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启蒙过了的时代?一个真诚的思者会回答:不,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正在启蒙的时代,因为我们时代的大多数人,都还未达到能够正确运用理性的时候。启蒙还远未结束,启蒙正在开始。在我们时代浩瀚的星空里,闪耀着启蒙的星座——康德,那是理性之光的星座。☉

注释:

①约翰尼斯·萨尔茨维德与马蒂亚斯·施莱贝尔《思想的纯金》,载于《明镜周刊》Nr. 1/29.12.03, 116-133页。Johannes Saltzweid/ Mathias Schreiber, *Das reine Gold des Denkens*, in: *Der Spiegel*, Nr. 1/29.12.03., S. 116-133.

②赫德尔《拔高人性的书简》1793年,见B·苏方编:《赫德尔全集》,第十七卷,柏林1881年,404页;转引自格尔德·伊尔利茨《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斯图加特2002,8页。Herder, *Briefe zur Beförderung der Humanität, 1793ff*; in: *S?mmtl. Werke*, hg. V. B. Suphan, Bd. 17, Berlin 1881, S. 404; zitiert nach Gerd Irlitz, *Kant-Handbuch. Leben und Werk*, Stuttgart 2002 S. 8.

③阿森叶伊·古吕加《伊曼努尔·康德》,法兰克福1985,75页。Arsenji Gulyga, *Immanuel Kant*, Frankfurt 1985, S. 75.

④⑤福尔克·格哈德《并非没有危险的生活》,载于狄纳·埃蒙茨编《康德与柏林启蒙运动》,威斯巴登2000,19-29页。Volker Gerhardt, *Kein harmloses Leben*, in: Dina Emundts (hg.), *Immanuel Kant und die Berliner Aufklärung*, Wiesbaden 2000, S. 19-29.

⑥康德致M·赫茨的信,1788年4月初。An Herz, Anf. April 1778.

⑦格尔德·伊尔利茨《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斯图加特2002,13页。Gerd Irlitz, *Kant-Handbuch. Leben und Werk*, Stuttgart 2002 S. 13.

⑧a priori 这个拉丁文词,蓝公武先生的文言文译本《纯粹理性批判》译为“先天”,韦卓民先生的白话文译本译作“验前”,并指出“先天”实系误译。笔者深以为然,故从韦卓民先生。

⑨I. Kant, *Erklärung in Beziehung auf Fichtes Wissenschaftslehre*, 7. August 1799.

⑩卡尔·波普尔《启蒙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为纪念康德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于1954年2月12日在英国广播电台的演讲,收录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57年德语版,第一部;引自第八版,图宾根1992,二十到二十九页。Karl Popper, *Immanuel Kant. Der Philosoph der Aufklärung, eine Gedächtnisrede*, gehalten im englischen Rundfunk an Kants hundertfünfzigstem Todestag, dem 12. Februar 1954, in: *Die offene Gesellschaft und ihre Feinde*, dt. 1957. Band I, dt. 8. Auflage, Tübingen 1992, S. XX-XXIX.